

# 新中国建国散文的大叙事特性

叶瑞莲

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slcheung@ied.edu.hk

## 目录

- I. 引言
- II. 建国散文的大叙事言说
- III. 大叙事下的读者反应
- IV. 大叙事下的作家意识
- V. 总结

## I. 引言

新中国成立期(1949-1956)所涌现的文学称为“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sup>1</sup>，也是“中外古今文学史上罕见的、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sup>2</sup>；然而，这些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作品，后来却多被评为“脆弱”、“强差人意”<sup>3</sup>。为甚么如斯盛极一时的散文无法在文学时空中永垂不朽？这是本论文要探讨的旨向。

“后现代主义之父”，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在《后现代的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1979)中，认为“启蒙运动”<sup>4</sup>的两大支柱——“求真精神”与“自由解放精神”，衍生了两套“大叙

<sup>1</sup> 朱栋霖(1949 - )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 1997》(上)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页60 - 61。

<sup>2</sup> 沈义贞(1964 - )，《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页22。

<sup>3</sup> 洪子诚(1939 - )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趋向笔谈：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2期，1995年3月，页71。

<sup>4</sup>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亦称“黎明运动”。欧洲中世纪，各种思想言论受禁锢，思想与学

事”(grand narratives)：一套富于激进，以法国大革命(1789)为代表，重视人文独立思考，关注自由解放；另一套以德国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为代表，重视共识与整体价值思维，关注真理思辨<sup>5</sup>。两套堂皇的大叙事彼此对立，却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对科学发展与理性主体解放贡献良多。黎活仁(1950-)指出，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而产生的辛亥革命(1911)属前一套大叙事，受黑格尔思想影响而出现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主义则为后一套大叙事<sup>6</sup>。

两套大叙事的叙述人都扮演着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分子”<sup>7</sup>的角色，他们跨越阶级，自我定位为某一制度、国家、群众、集团、信念的代言人<sup>8</sup>，力图通过各种公开叙述来把握事物本质，展示真理和社会规律，启蒙大众。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或译作詹明信, Frederic Jameson, 1934-)认为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例如天主教思想，莫不拥有一套权威的大叙事言说机制<sup>9</sup>。这些大叙事体系是一种典范的言说，将人分类、标签，将情节普遍化，将叙述者、听众、演员安排在固定的位置上，赋予特定的角色与功能。

## II. 建国散文的大叙事言说

五四时代重视“个人”的发现，那时散文的特质主要也是“个人的(personal)”<sup>10</sup>。然而自30年代起，随着时局的剧变，国共内战与抗日战争的爆发，作家的个人意识逐渐淡化，散文的题材也从个人空间，跳向社会大舞台；从形形色色的身边琐事书写，转为关乎普罗大众的大是大非客观记叙。这种审美的倾斜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增无减。

---

术发展一片黑暗。十七、八世纪之交，有一派学者起来打破这种思想垄断的局面，专以开拓蒙昧，普及文化为务；整个运动的特征为尚实利、重实际、以理性为万能、主张个人自由、排斥宗教与国家之权威、注重求真与精析。

- 5 朱立元(1945-)：《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372-373。
- 6 黎活仁，《新诗的杂文化：戴天诗的”大叙事”精神》，载黎活仁主编，《香港新诗的”大叙事”精神》(嘉义：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1998)，页115。
- 7 尹昌龙(1965-)，《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29。
- 8 孙先科(1964-)，《领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15。
- 9 杰姆逊与张旭东，《政治、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6期，1996年9月，页4。
- 10 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17卷3号，1926年3月10日。

1949-1956年间的散文作家队伍阵容鼎盛，沈义贞据《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集》（1948-1966）<sup>11</sup>及《散文特写选》1至3册<sup>12</sup>的篇目，列举出来的作家有近百人<sup>13</sup>。这批作家的年纪、地位、经验、身份、遭遇悬殊，作品风貌却出奇的大同小异：扔弃个人叙事立场，转向宏大叙事，倾向建立普遍性、共通性、规范性、绝对性的统一言说。

## 1. 新中国万岁

建国初期的散文，题材离不开新中国的变化，例如开国大典、土改建社、抗美援朝（1950-1953）、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处处突现人民对现实的肯定、对未来的憧憬。在那个热情燃烧的年代，社会生活的巨变与人民的心理状态，跟40年代的紧张颤动氛围如出一辙，激动人心的材料俯拾即是。

开国大典热浪滚滚，万里晴空。杨刚（杨季征，1905-1957）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1949年10月2日）<sup>14</sup>是这类高亢激昂作品的典型代表：

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

杨刚写的不单是当前，也是未来：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兼备的国家……一定会实现。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

“新旧两重天”是新中国散文的大叙事的方程式：解放前地破败，人凄苦；解放后地向荣，人幸福。解放前地破败，人凄苦；解放后地向荣，人幸福。陈窗的〈海南岛散记〉（1954年8-11月）<sup>15</sup>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神迹：

<sup>11</sup> 陈荒煤（1913 - 1997）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集（1948 - 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sup>1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编，《散文特写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册1 - 3。

<sup>13</sup> 同注2，页24。

<sup>14</sup> 同注12，册1，页1 - 6。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人们正在使荒凉的山野变成繁荣的城市，正在使民族的仇杀变成友爱，并且正在逐步消除昨天的黑暗而走向幸福的明天。……

白米婆过上了毛主席时代的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年轻，……眼睛看得见了，耳朵也不聋了。

在旧社会里的小人物“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终日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然而新社会一降临，他们便能一扫霉气，各展所长。秦兆阳(1916- 1994)的〈老羊工〉(1954年3月1日)<sup>16</sup>写的是一个与羊相伴整整五十年的老羊工冯常福的感人见证。他在解放前挨饿受冻，挨打受骂，被挤出“人的世界”，自己也变得寂寞麻木。解放后，由于受到政府器重，被看成为放羊专家，终于能“在人们的世界露露脸”，不仅主动地关心起集体的事务，而且精神上“年轻”起来。

曹禺(万家宝，1910-1996)在北京走了半天，走过龙须沟、北京体育馆、百货大楼后，感动得不能自己，写下〈半日的“旅行”〉(1956年2月)<sup>17</sup>：

当我们在车间里，在实验室里，在办公楼里，在广阔的拨掉了界石田野里劳作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四周围的环境在变化，新的事不断地涌现，新的人不断地成长。一切都在飞快地向前奔，它不停脚，不等待任何人。只要放眼一望，一个强烈的感觉就会抓住我们，那就是革命在进行，革命像是坐着喷气式飞机在前进。

这样的赞叹跟老舍（舒舍予，1899-1966）在〈我热爱新北京〉（1951年1月25日）<sup>18</sup>所流露的，异曲同工：

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

处处锣鼓，页页红旗，革命停不下来，大叙事的言说也停不下来。这种言说来自言说者的心灵与经验的交互作用，是实况，也是憧憬；就是这种主动、真诚、铺天盖地的大叙事，建构了那个火红年代的时间、空间、社会与历史。

<sup>15</sup> 同注12，册1，页135 - 165。

<sup>16</sup> 同注12，册1，页106 - 117。

<sup>17</sup> 同注12，册1，页320 - 327。

<sup>18</sup> 同注12，册1，页25 - 28。

## 2. 无产阶级必胜

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意识与社会意识不断强化，在大时代的呼唤下，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人人站了起来，整个中国翻转了，一浪接一浪的革命，一波接一波的斗争令战争文化延续不灭，汹涌澎湃。

陈思和(1954-)指出，49年后文学现象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涨，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抗拒等都是硝烟的痕迹<sup>19</sup>。新的历史时期烽烟四起，无产阶级领导层在每个领域，包括民生与艺术都刻意发动“思想战役”——务必把各种无形的、隐蔽的、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敌人”消灭，把全国每个阶层每个成员的想法都统一到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上来<sup>20</sup>。

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文学用语自然带着硝烟，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上，触目都是“会师”、“胜利”、“战役”、“插红旗”、“拔白旗”、“文艺大军”、“锋芒直指”、“猖狂进攻”、“引蛇出洞”、“打响了”、“突破”、“战斗”、“斗争”、“武器”等军事词汇<sup>21</sup>。沈从文(沈岳焕，1902-1988)的小儿子沈虎雏在学校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家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sup>22</sup>战争文化的普遍与深入，于此可见一斑。

王利芬受到苏联学者普罗普(Vladimir Propp, 1895-1970)研究俄国民间故事<sup>23</sup>及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 <sup>24</sup>研究俄狄浦斯(Oedipus) <sup>25</sup>神话的启迪，在整理1976年前的100部不同体裁的作品时，把作品中的人物归为七大类：主角、反角、中立者、助手、反助手、胜利者、失败者；把作品的内容结构总结为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对抗(生产斗争)、人民内部的对立(思想斗争

<sup>19</sup>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绪论页6。

<sup>20</sup> 同注2，页23。

<sup>21</sup> 同注19，绪论页6。

<sup>22</sup> 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传记文学》2卷1期，1963年1月，页15。

<sup>23</sup> 普罗普1928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Folktale*, trans. Laurence Scott, 2 ed., Austin: U of Texas P, 1968)，通过对100多个俄国童话故事的研究，发现故事人物和情节虽千变万化，但故事人物推进情节的行动(功能)却有限，因而归纳出31种功能、7个情节范围、7个人物类型。

<sup>24</sup> 克劳德·利瓦伊史陀在1958年发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分析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话。把故事中的成分以数字表示，整理出包含8个纵向栏目及4个横向栏目的图表，体现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中的同质元素。

<sup>25</sup> 俄狄浦斯是希腊传说中的国王，曾杀父娶母。

)<sup>26</sup>。这种划分与建国文学的大叙事钢铁框架不谋而合。

最明显的是写阶级对立，例见魏金枝(1900-1973)的〈任樟元和三个地主〉(1950年10月15日)<sup>27</sup>。任樟元曾先后给三个地主欺压。但自推行土地改革后，一切翻天覆地，“地主再也不能作怪”了。

臧克家(1905-2004)著名的〈毛主席对着黄河笑〉(1955年1月)<sup>28</sup>，是写人与大自然对立的表表之作，在这场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主席胜利了：

黄河，这流经七个省份，流长五千公里的来自天上的水，是任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饥饿猛兽。……

千万年来滔滔的浑黄浊流，我们要叫你一清见底。

黄河，一个领导全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巨人，走近了你的身旁。他笑着向你招呼，他也要你彻底翻一个身。从他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河远景。

孙犁(孙树勋，1913-)的〈婚俗〉(1953年9月4日)<sup>29</sup>描述的则是老百姓的思想斗争。当同村的新媳妇嚷着要离婚时，村里的宣传委员赵金铭是“很不同意的”，但看过政府人员在邻村“做贯彻婚姻法的示范”后，虽老大不愿意，也还是依从党的政策，力劝新媳妇的婆婆不要当落后的“典范”，接受离婚的事实。在这篇散文中，对立斗争的两方，分别是党的政策与封建观念；结果自然是党的文明指示大获全胜。

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氛围发展出来的大叙事散文，反复吟唱着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无产阶级(工农兵)必胜，敌人(美帝、地主、蒋匪、反革命分子、小资产阶级等)必败<sup>30</sup>；作品中的二项对立并非旗鼓相当，而是理所当然的前者高，后者低；前者是，后者非。

### 3.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英雄叙事”(heroic narration)是建国散文的重要内容。塑造英雄形象、宣传英雄事迹、以

<sup>26</sup> 王利芬，《变化中的恒定：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主义透视》(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页109 - 111。

<sup>27</sup> 同注12，册1，页18 - 24。

<sup>28</sup> 同注12，册1，页166 - 169。

<sup>29</sup> 同注12，册1，页62 - 65。

<sup>30</sup> 杨寿堪(1933 - )，〈论哲学的时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2期，1998年3月，页44。

英雄为楷模的舆论营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话题<sup>31</sup>。“英雄叙事”淹没个人情感，以正义、崇高、拼搏等神圣品格作为个人主体，以英雄的道德感和价值观作为个人的终极思想<sup>32</sup>。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英雄，建国时期出现的是“革命英雄”。革命英雄由党孕育成长，党就是英雄的灵魂<sup>33</sup>。闵抗生(1937-)在分析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85-1881)的观点<sup>34</sup>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是不可能摆脱“英雄崇拜”这个轴心的，即或革命亦然，因为它也是一方面在破坏偶像，另一方面却急不及待建立新的英雄崇拜<sup>35</sup>。建国时期的英雄题材铺天盖地，写之不竭，“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纪实散文由是发展蓬勃。中国人民志愿军把“革命的爱国主义结合了国际人道主义”<sup>36</sup>，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别的民族牺牲，可说是英雄中的英雄。巍巍(魏鸿杰，1920-)最初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sup>37</sup>是这类英雄叙事的代表作；自是，“最可爱的人”便成为了当代民众对援朝抗美志愿军的昵称。

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人抱得那么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

怎么能不觉得(苦)?咱们革命队又不是个怪物……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甚么，吃这点苦又算甚么哩!

31 赵联成，〈升腾与沉落：论当代报告文学英雄主题的流变〉，《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期，1998年7月，页58。

32 杨伦理，〈主旋律叙事与英雄叙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1期，1999年2月，页35 - 39。

33 杨朔(1913 - 1968)，《三千里江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页164 - 165。

34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35 闵抗生，〈尼采哲学的独异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卷，1998年4期，1998年10月，页15。

36 马永强，〈英雄主题的转换与升华：建国以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回顾〉，《晋阳学刊》，1999年3期，1999年5月，页64。

37 同注12，册1，页29 - 34。

“英雄的行为”、“英雄的价值观”一览无遗。据黑格尔的理论，这类伟大人物并不是物质条件的产物，而是其所处时代的精神表现，是那个世代文化的灵魂<sup>38</sup>。

另一类受人民歌颂的是“潜在的英雄”，他们具先知先觉的洞察力，意志力较一般人坚定，能看准实现理想的方法，而且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sup>39</sup>。他们高瞻远瞩，努力不懈。由于这类“潜在的英雄”多未能亲睹新中国的诞生，因而这类作品读来总带点悲凉味道。例见巴金(李尧棠，1904-2005)的〈怀鲁迅(周樟寿，1881-1936)先生〉(1949年10月11日)<sup>40</sup>：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花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

鲁迅如是，洗星海(1912-1935)亦然。光未然(张光年，1913-2002)在《回忆洗星海同志》(1949年10月)<sup>41</sup>一文中写道：

他的歌曲，是革命的民族气派的产物。他准确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大革命前夜的时代精神，豪强多彩而勇于创造。同聂耳一样，他死得太早。

这些在各类战线上涌现的英雄如恒河沙数，特写的任务并不在于叙述现象，而是在于透过突显现象，震撼人心，强化大时代的新风尚。

### III. 大叙事下的读者反应

感动，感动……不胜枚举。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指出，神话的特质在于信息重复，好纠正噪音所带来的错误，令民众在细节虽不尽相同，但信息本质相若的芸芸叙事中，加深对神的认识、膜拜<sup>42</sup>。“健康的、有益的”主旋律不断给人们熏陶，

<sup>38</sup> 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历史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王清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41。

<sup>39</sup> 同注38，页161。

<sup>40</sup> 同注12，册1，页7 - 10。

<sup>41</sup> 同注12，册1，页11 - 17。

<sup>42</sup> 利奇，〈作为神话的《创世纪》〉(*Genesis as Myth*)，载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页128。



令人们不自觉地“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图中，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sup>43</sup> 这种情况，就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说般，是“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雄据天下的时候<sup>44</sup>。“文化霸权”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完全由上而下刻意建构出来的社会秩序，是普罗大众的强制性文化选择<sup>45</sup>。葛兰西认为，霸权这种社会领导，不一定由暴力或权力的威吓所确立与操控，甚至也未必获得所控制的属民与被压抑社群的同意或支持；但霸权的操控却令他们不自觉地把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视为自然而然的产与“平常意识”(common sense)<sup>46</sup>。

建国散文是记录新中国学步的重要文献。作者冲出个人的小天地，走向农村、工厂、部队、边疆、国外；然而，千姿百态，无所不在的生活却在“深入”、“体验”中变得越来越“单一”、“狭隘”<sup>47</sup>。大叙事下的典型人物描写，也由于性格行为镌刻着明显的阶级烙印，留下给读者的，只是一尊尊表情划一的塑像，无助于审美欣赏与文本分析<sup>48</sup>。

虽然当时代的作家对黑格尔的大叙事乐此不疲，但建国后不足一年，读者已十分厌腻这些和弦乐音。丁玲(蒋伟, 1904-1986)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见于1950年出版的《文艺报》)中谈到一年来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总的来说，均表示不喜欢描写工农兵的作品，认为主题狭窄、重复，手法千篇一律，老是开会、自我批评、谈话、反省<sup>49</sup>。

吴炫(1960-)指出，当文化使命直接成为文学使命时，无论该文化使命的意义有多大，都只会损

<sup>43</sup> 宋球勋，〈论文艺创作几个关系的处理〉，《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卷，1998年3期，1998年7月，页114。

<sup>44</sup> 据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丹尼尔(Daniel Bell, 1919 - )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道德秩序的倾颓〉(*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Decline of Moral Order*, 邱彦彬译)，载《中外文学》24卷7期，1995年12月，页24，这是葛兰西最早用来描绘占着领导地位的一小撮人，例如昔日的天主教教会、苏维埃世界统治者如何向当代群众施加主宰性的世界观。

<sup>45</sup> 杨扬，〈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5期，1994年9月，页37。

<sup>46</sup> Joseph Childers & Gary Hentzi ed.,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c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1-132.

<sup>47</sup> 马俊山(1956 - )，〈反思过去那样的“深入生活”〉，《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4期，1997年7月，页18 - 20。

<sup>48</sup> 李青果，〈从典型塑造看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6期，1997年11月，页108 - 109。

<sup>49</sup> 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49 - 1976) (洪子诚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卷5，页37 - 44。

害文学本体性<sup>50</sup>。这些带着历史使命的作品，“实象”多，而“意象”少<sup>51</sup>，未能令读者感受到阅读的“极乐”。法国文学理论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文本的快乐》<sup>52</sup>中曾谈及阅读能为读者带来两种愉悦感——“快乐”和“极乐”。“快乐”指的是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其所处的文化融和，如鱼得水。“极乐”的层次远较“快乐”的为高为深，指的是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其所处的文化出现不谐协(例如：文本扰乱了对历史、文化、心理的种种设定)时，读者情感受到冲击，被迫跳离熟悉的，安全的，能理解的框架，精神领域却因而得到拓阔与提升。从“十七年文学”的内容与读者反应看来，这批建国散文并未足以把读者带往“极乐”的境地。

#### IV. 大叙事下的作家意识

鼓乐喧天的开国大典过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巨伞下，散文仍然明媚一片。西方的“现实主义”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反映生活，可以完全无涉作家的主观世界，那是一种纯客观的描写式真实<sup>53</sup>。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称这种思想为“批判现实主义”，与属于“理想的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内，现实已与理想合而为一，矛盾已完全解决，现实再没甚么可给批判了，只等待万众一心的赞美<sup>54</sup>。在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监控下，苏联出现了许多粉饰现实、公式化的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30年代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认同与吹捧。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sup>55</sup>，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政策。这样的主旋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学的宏观调控及导向把握”<sup>56</sup>。这个系统化文学观确认文学的接受与表达对象只可以是工农兵。这次讲话在1949年7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确认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sup>50</sup> 吴炫，〈走向艺术否定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2期，1997年3月，页68。

<sup>51</sup> 余树森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7。

<sup>52</sup> 巴尔特，〈文本的快乐〉(*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1973)，载霍克思(Terence Hawkes)，《结构主义和符号学》(*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页118。

<sup>53</sup>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战斗精神〉，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2期，1987年5月，页34。

<sup>54</sup> 杨春时(1948 -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艺思潮〉，《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1期，1995年1月，页120。

<sup>55</sup>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页854 - 855。

<sup>56</sup> 吴秀明(1952 -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主旋律文学创作〉，《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6期，1997年11月，页107。

建国后，文学的主线基本上是延安文学的延续<sup>57</sup>。作家对政策的回应，除关乎个人的艺术前途，还影响到家人的命运。自此，建国散文完全背离了五四精神。郁达夫(郁文，1895 - 1956)认为五四文学最难能可贵处，“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sup>58</sup>。没想到不足半世纪，作家纷纷走回头路，刻意以大我浸没小我。然而，这种以工农兵为核心的“大我”也许只会像在中国出生的美国政治理论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 1936-)所云般，是一种“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是民族主义者把不平等的剥削状态以及民生困顿掩盖后的一种创造，是概念化的形象<sup>59</sup>。有学者用只会把事物投影如实折射回去的“一面平面的反光镜”为喻，指出当时作家如出一贯的思维模式：对客观事物感受的描写，完全以表现该事物的社会意义为依归<sup>60</sup>。

诚如李欧塔所言，大叙事的出现，掩盖了其他小众的发声机会，也抹杀了其他群众存在的历史经验和意义<sup>61</sup>。向来我行我素的沈从文，在建国前已不幸成为左翼作家的批判对象。他负责编辑的几家报纸副刊，因时局关系先后停办；他在1948年写给一位年轻作者的退稿信中，明确透露自己在追不上这个时代的情况下，只得选择封笔闭口：

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格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sup>62</sup>

王国维(1877-1927)的“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这句话，最能表现这些在大时代转变期间“总是不知去向”的知识分子的失语痛苦<sup>63</sup>。在主旋律以外，零星地出现了毛泽东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即有别于所流行的大我大题材大叙事的作品。沈从文写于1949年5月30日的〈五月卅下十点

<sup>57</sup> 据李葆琰，〈试论解放区文学大众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3期，1982年9月，页294，周扬(1908 - 1989)曾声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

<sup>58</sup> 郁达夫，〈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36)，页5。

<sup>59</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New York: Verso, 1983, pp.6-7.

<sup>60</sup> 注51，页10。

<sup>61</sup> 同注46，页181。

<sup>62</sup> 吴立昌(1937 -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页307。

<sup>63</sup> 韩毓海(1965 -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上海文学》，1994年11月号，1994年11月，页68。

北平宿舍》<sup>64</sup>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是一篇题在“呓语狂言”下的病中手记，是沈从文在受不住现实压力下精神失常，后来自杀获救，在调养休息时写成的，充分表达脆弱的小我在时代巨轮下的微弱呼声。

从字里行间看来，沈从文的精神状态不大好，但他清楚知道周遭所发生的事。他晓得远处似有鼓声响起，整个世界都在沸腾，但对他来说，那刻最真实不过的只有孩子在邻房中传来的鼻鼾声。虽然举国上下都为东方红，太阳出而欢呼，但他却在孤零零地守望着，由始至终也不晓得自己该等待什么，希望什么。他既和时代脱节，自然没有能力扮演代言人的角色：

我手中的笔，为甚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关系，失去意义？<sup>65</sup>

这样的一个年代是完全没有空间留给小叙事的，沈从文的做法，等同“毁灭自己”<sup>66</sup>。葛兰西认为所有人都可以说得上是知识分子，但只有少数人拥有知识分子的功能<sup>67</sup>；“疯”了的沈从文，肯定是个典型的“志业型的知识分子”。这类“志业型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个性立场，不肯接受意识形态的思考，不预设理想观众，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没想过要当民众的精神导师<sup>68</sup>。

建国时期所呈现的石破天惊新气象，令人目眩神迷，甚至今日新时期大部份的作家与理论家也不大敢于正视十七年文艺工作途上的坎坷<sup>69</sup>。谢冕(1932-)慨叹五四时代光芒显赫的巨匠蓦地在刹那间失去智慧，一概告别了自己从前在文学史上所创造的辉煌时代，“创造了迄今为止，我们记忆犹新，甚至历久不逝的文学的不辉煌”<sup>70</sup>

李泽厚(1941-)批评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稳占席位，一向以小叙事见称的大家，如叶圣陶(叶绍钧，1893-1988)、冰心(谢婉莹，1900-1999)等所写出来的作品，“主观上相当忠诚、客观上

<sup>64</sup> 沈从文、张兆和(1910 - )，《沈从文家书：1930 - 1966从文、兆和书信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页153 - 154。该篇文章收于书中的“呓语狂言”部分。该部分收集了目前尚存的有关沈从文在病前、病中，直到病情逐渐减轻过程中所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

<sup>65</sup> 同注64，页154。

<sup>66</sup> 同注64，页154。

<sup>67</sup> Ellis Cashmore & Chris Rojek, ed., *Dictionary of Cultural Theorists*. London: Arnold: 1999, pp.204-206.

<sup>68</sup> 王世诚，〈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说话，该说甚么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1999年9月，页8。

<sup>69</sup> 李扬(1963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3期，1999年5月，页90。

<sup>70</sup> 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页17。

相当滑稽”<sup>71</sup>。他们兴高采烈地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接受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但工农兵的生活始终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也不一定由衷热爱，因而写来总手不从心。

巴金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曾这样剖白：“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成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sup>72</sup>

回顾过去，杨朔说得更直接：“说实话，从前我有一种不正当的顾虑，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虽然经过整风学习，总还留着尾巴。因此我在作品里，有意不写感情。我怕一写感情，把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流露出来就不妙了。其实这是骗人，也是骗自己。”<sup>73</sup>大多数的作家就是这样自觉地过滤小我的感情，书写大叙事，美化政治的要求。

在1957年给毛泽东划为“中间偏右的典型”的科学家傅鹰(1902-1979)这样说过：

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中国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sup>74</sup>

不管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往跟新政权的关系怎样，他们大部分都是怀着敬虔的心情来迎接新生活的。

孟繁华认为中国“士”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使命意识是一种来自民族的文化遗传，这种原型的民族文化特征一直盘踞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心<sup>75</sup>。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1884-1942)说，“文化心理遗传”既属于“个人心理性质的文化”，也属于“集团的超个人性质的文化”<sup>76</sup>。这种“文化心理遗传”一旦在社会转型时，便会令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紧张起来，自觉地承担起维护道义和安邦定国的责任。新中国的成立正好是社会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大转型，这解释了为甚么大叙事精神在建国初期的散文能够兀立不倒，为

<sup>71</sup>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1），页309。

<sup>72</sup> 巴金，《我和文学——1980年4月11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王毅钢选编：《写作生活的回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页229。

<sup>73</sup> 同注32，页168。

<sup>74</sup> 叶永烈(1940 - )，《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页569。

<sup>75</sup> 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页3。

<sup>76</sup>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What is Culture, 费孝通<1910 - 2005>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页10。

甚么对多数作家来说，把小我融合于大我是自觉而又自然的选择，为甚么他们会在“不可动摇的信仰和合理安排的诺言中陶醉而不能自拔”<sup>77</sup>。这种以光明代替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写法，大多带著作家“教育人们、感动人们、推动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sup>78</sup>的良好意图。何况，个人造就历史的前进还一直是“现代”(modern)论述的精神<sup>79</sup>。

## V. 总结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澎湃热潮逐渐减退，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日益暴露，再加上当时苏联文学“干预生活”的思潮，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探讨该走的方向。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第一次批判斯大林主义，成为了中国作家对个人崇拜的另一次冲击。1956年，散文的大叙事主调开始产生变化，老舍的〈养花〉(1956年10月21日)<sup>80</sup>、秦牧(林觉夫，1919-1993)的〈社稷坛抒情〉(1956年)<sup>81</sup>等杂文类散文出现了。可惜这股尚未成形的，注重个体感受的浪潮却给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情地压下去。在政治阴霾笼罩下，文革时期的样板文学出现了，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狠狠地把文学作品拖进死胡同去，阶级斗争的观念给文学直接造成无可挽救的自戕局面。

如何评价作家、作品、历史，一直是文艺思潮的争论中心<sup>82</sup>。福柯认为知识分子不必自我扮演希腊智者、犹太立法者、罗马法官等角色，用人云亦云的口吻宣示从人皆知的使命——大叙事。他强调知识分子须在不鼓励动脑筋的环境和种种约束下积极寻觅自己的路向，无视人家的看法与自己的观念在日后的对错问题<sup>83</sup>。“十七年文学”，对福柯来说，只是响过不已

<sup>77</sup> 一韦与刘宏九，〈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分延〉，《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1999年3月，页143。

<sup>78</sup> 岳凯华，〈民族与大众化的艺术实践：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创作一瞥〉，《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1期，1998年1月，页81。

<sup>79</sup> R. J. Johnston et al.ed.,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p. 512-516.

<sup>80</sup> 同注12，册1，页419 - 420。

<sup>81</sup> 同注12，册1，页442 - 448。

<sup>82</sup> 殷越，〈新时期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几点经验〉，《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5期，1999年9月，页21。

<sup>83</sup> 这段话是福柯在接受“新法国哲学家”亨利·莱维(Bernard Henri Levy, 1948-)的访谈中所发表的。全文初见于1977年3月12日的《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发表于1977年32期的*Telos*。后辑于《权力与性》，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8。

的噪音。英籍犹太裔哲学家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认为, 文本在世界中的位置决定了文本的意义; 读者只有放弃个人的文化偏见及人为的哲学推论, 理解文本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 才可走进文本解读这个语言游戏中<sup>84</sup>。然而, 无论用福柯, 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作为对“十七年文学”的大叙事观点的唯一尺度, 也是有欠公允的, 漠视了那个时空的独特语境。

姑勿论读者是站在批判或谅解的立场, 拿着的量尺是后现代的, 还是火红年代的; 无可讳言, 这批盛极一时的散文赢得的称许只如昙花一现般。也许原因就有如大叙事的权威代言人马克思所说般: “人们既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 为甚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 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sup>85</sup>”

---

<sup>84</sup> 罗坚, 〈美学的困境与美的解构: 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概论〉, 《外国文学评论》, 1999年2期, 1999年5月, 页118。

<sup>85</sup> 马克思、恩格斯(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着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卷, 页7。

## 参考书目

-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编, 《散文特写选》, 1-3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福柯(Foucault, Michel), 〈权力与性〉,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严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缙广飞, 〈尽显英雄本色, 中西神话英雄形象比较〉, 《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 1999年1月。
- 韩毓海,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 《上海文学》1994年11月号, 1994年11月。
- 何春蕤, 〈与解构对话, 罗逊的实用主义策略〉, 《中外文学》22卷7期, 1993年12月。
- 洪子诚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1949-197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胡克, 悉尼(Sidney, Hook), 《历史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 王清彬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杰姆逊(Jameson, Fredric)与张旭东, 〈政治、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 《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1996年9月。
- 李青果, 〈从典型塑造看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1997年11月。
- 利奇(Leach, Edmund), 〈作为神话的创世纪〉(*Genesis as Myth*), 叶舒宪编选, 《结构主义神话学》,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台北: 风云时代出版社, 1991。
- 罗坚, 〈美学的困境与美的解构, 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概论〉, 《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999年5月。
-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文化论》(*What is Culture*), 费孝通等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马永强, 〈英雄主题的转换与升华, 建国以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回顾〉, 《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1999年5月。
- 孟繁华, 《梦幻与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广州: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余树森等, 《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沈从文、张兆和, 《沈从文家书, 1930-1966——从文、兆和书信选》,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8。



- 沈义贞, 《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 宋球勋, 〈论文艺创作几个关系的处理〉,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 1998年第3期, 1998年7月。
- 孙绍振,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 孙先科, 《领祷与自诉, 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王利芬, 《变化中的恒定, 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主义透视》, 广东: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吴立昌, 《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传》, 台北: 业强出版社, 1992。
- 吴秀明,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主旋律文学创作〉, 《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1997年11月。
- 吴炫, 〈走向艺术否定论〉, 《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1997年3月, 页67-70。
- 谢冕, 《文学的绿色革命》, 贵阳市: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杨春时,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艺思潮〉, 《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1期, 1995年1月。
- 杨伦理, 〈主旋律叙事与英雄叙事〉,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999年2月。
- 尹昌龙, 《重返自身的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岳凯华, 〈民族与大众化的艺术实践, 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创作一瞥〉, 《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998年1月。
- 赵联成, 〈升腾与沉落, 论当代报告文学英雄主题的流变〉,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1998年7月。
- 朱栋霖等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Abstract**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 Narrative in Prose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a (1949-56)**

**Ye, Rui-lian**

A system of narratology endowed with Hegalian insights can be discerned in prose writing between 1949 and 1956, the period of state foundation in modern China, if Jean Francois Lyotard's analysis of postmodernism is deployed. This recurring theme of grand narrative steered the literary tides, helped exhibit the newborn state, socialism, peasants and heroes to the mass, and were highly commended. These works, however, have failed to sustain their indispensability when the tides have been over.

Key words: Grand narratives, Prose of Modern China, State founding,  
17-year literature